

18世纪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的语法化特征*

米热古丽·黑力力

[摘要] 本文借助语法化理论,从体貌和情态范畴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察合台文档案及《和卓传》中的后置动词结构语料,考察18世纪维吾尔语的-A tur-、-(X)p baq-、-(X)p tur-、-(X)p čiqliq-、-(X)p ibär-、-(X)p at-、-(X)p tašla-、-GAll bol-、-A al-、-(X)p bol-等结构的语法功能。经研究认为,维吾尔语的后置动词结构使用频率较高,通过语法化可表示体貌、情态等语法范畴。

[关键词] 维吾尔语 后置动词结构 语法化 体貌 情态

一 引言

18世纪是维吾尔语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现代维吾尔语的许多语言现象,如元音高化、词末浊辅音的清化^①、音节末颤音/r/的脱落^②、-A turur^③演变成语缀-Idu^④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出现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察合台文档案的语言特征对研究18世纪维吾尔语^⑤的面貌有重要意义。这批档案文书均为清代回疆大臣的呈文、奏折,是研究维吾尔语的珍贵历史材料。其中,乾隆年间的档案甚多,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相对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维吾尔语口语。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在1780年左右以喀什噶尔和卓家族的历代指导者生平为中心、采用察合台文所写成的《和卓传》(Täzkirä-yi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视野下的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研究(21BZS028)”的阶段性成果。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据庄垣内正弘(1979:49)的研究,18世纪维吾尔语(《五体清文鉴》)中已出现seriq“黄色”、yerim“半”等形式,这两个词中出现首音节元音高化、词末浊辅音清化等现象。

^② Haenisch (1954:188) yaňşı yürdünlämu (59) 中复数附加成分-lAr 中出现/r/脱落。

^③ 转写符号中 A 代表 a、ä, I 代表 i、ϊ, G 代表 g、γ, X 代表 a、ä、e、i、ϊ、o、u、ü, U 代表 u、ü, D 代表 d、t。

^④ 《满蒙回文三种译语》: hābär čapturedu “传递信息”(16)(Haenisch 1954:186)。

^⑤ 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察合台文档案和《和卓传》书面文献语言。本文中的语料文献可分为两类,一是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和卓传》抄本,编号D127(文中使用的略语是A),二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本文所用的档案编号略语如下,B: 03-0190-2998-006; C: 03-0190-3019-038; D: 03-0190-3019-033; E: 03-190-3019-042; F: 03-0211-4593-019; G: 03-0190-3019-036; H: 3035-010-132-0549; I: 03-0191-3092-009; J: 03-0190-2962-030; K: 03-0190 3019-040; L: 03-0177-1736-003; M: 03-0177-1731-006; N: 03-0190-3019-030。

‘Äzizan), 除作为重要史料外, 还可以作为了解当时维吾尔语书面语的语料。

本文对 18 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出现的 -A tur-、-(X)p baq-、-(X)p tur-、-(X)p čiq-、-(X)p ibär-、-(X)p at-、-(X)p tašla-、-Gall bol-、-A al-、-(X)p bol- 等后置动词结构所表示的体貌和情态范畴进行探讨。

二 后置动词结构

维吾尔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后置动词结构由副动词和助动词构成 (Johanson 2021:597)。后置动词结构表示体貌和情态范畴, 其缀接于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 以不同的方式描述情状。

后置动词结构与谓语动词共享同一个视点体、时、式、情态和示证范畴 (Johanson 2021:597)。后置动词结构的助动词具有不共享实义动词的谓语性特点, 因此不带独立的主语或宾语。

后置动词结构的主要成分是助动词, 数量不多^①, 主要源于表示“去”“来”“走”“出去”的趋向动词, 表示“站”“留”“坐”“躺”的姿势动词, 表示“开始”的起始动词, 以及表示各种活动的动词, 如“做”“摆”“拿”“给”。

后置动词结构的另一个成分是副动词附加成分。后置动词结构中常见的副动词附加成分有 3 种: ① -(y)A 通常表示界内体意义, 即视点在事件终点之内的过程, 包括一般体、进行体、未完成体等; ② -Gall 表示界内体意义, 即修饰表示趋向的动词; ③ -(X)p 表示界后体意义, 即视点在事件终点之后, 包括完成体、结果体等。

语法化是词汇性单位衍生出一种语法性功能, 或者语法性单位衍生出一种新的语法性更强的功能 (Heine & Kuteva 2012:2)。一个实词一旦开始语法化, 那么它就会沿着语义虚化、句法泛化、语用淡化、语音弱化的路径发展, 由半实半虚到充分语法化, 再到过度语法化, 最终到表义功能趋于零、句法功能似有似无、语音形式走向消失 (刘丹青 2001)。有些后置动词结构的语法化程度较高, 经语音缩减完全变为语缀。如后置动词结构 -A al-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由分析走向黏着, 高度语法化为 -(y)AlA-。

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经语法化获得了新的语法功能, 缀接于多种动词词干后表达体貌范畴和情态范畴。“体貌”表示事态的时间结构样貌以及对其进行观察的方式, “体”作为“体貌”的下位范畴, 实际上是“视点体”的简称, 指对事态时间结构的观察方式, “貌”指的是表示事态时间结构样貌的“动貌”。情态范畴是将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或观点通过语法形式体现的成分 (Lyons 1977:452)。

三 体貌范畴

体貌范畴指事态的时间结构以及对事态时间结构的观察方式。体貌范畴包括视点体和动貌两个下位范畴。视点体对如何呈现事态选择不同的观察方式, 而对谓语所表达的事态本身的时间结构特征 (即动貌) 毫无影响; 动貌范畴本身的时间结构特征是稳定的, 不因说话人选择不同的视点体算子而变化 (Johanson 2000:31)。

^① 据力提甫·托乎提 (2012:351-355), 此类后置动词结构的数量为 22 个。

Johanson (2000:30-31) 指出, 视点体范畴表达的是“界限性”概念, 其反映的是人类认知和处理时间的基本方式。“视点体算子”是在动作内容的基础上施行操作, 而“动貌”反映谓语在内阶段结构上的特征。动貌层次上的成分具体仅体现“动作内容”, 其自身并不具备影响视点体功效。视点体对应“算子”; “动貌”对应视点体的处理对象, 即“运作对象”。

后置动词结构是维吾尔语表达体貌最常见的结构。下面借鉴 Johanson (2000) 分析视点体和动貌框架的方法, 对 18 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后置动词的视点体与动貌特征进行分析。

(一) 视点体

体范畴并不关心情状发生的时间与其他时间点的联结, 只关心情状内在的时间结构(伯纳德·科姆里 2016:4)。伯纳德·科姆里 (2016:2-3) 认为, “体”范畴是观察一个情状的内部时间结构的不同方式, 主要的观察方式有完整体和未完整体两类: 完整体从外部观察情状, 不区分情状的内部结构, 而未完整体从内部观察情状, 与情状的内部结构相关。完整体可定义为完成了的情状行为, 未完整体可定义为一种延续过程观察的情状。伯纳德·科姆里 (2016:42-46) 提出的完成体不直接说明情状本身, 而把某一状态和先于它的一种情状联系起来, 其可分为结果完成体、经历完成体、持续完成体、过去完成体。未完整体可以分为惯常体和持续体; 持续体又可分为进行体和非进行体, 前者用于动态情状, 后者用于状态情状。

根据 Johanson (2000:32), 视点体是说话人对某一情状所选择的观察角度, 并通过视点标记体现出来。“视点”是从体的角度观察情状的方式, 而“视点体算子”运作于“动作内容”之上并决定“动作内容”的体, 确定观察情状的方式。Johanson (2000:29) 从“观察视点”与事态的界限(即起点和终点)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分类: 界内体、界后体、界限体。

Johanson (2000:38) 论述视点体时用“聚焦”概念, 其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参照点观察情状时对情状的状况在心理上关注或聚焦的程度。界内体和界后体一般显示出不同级别的聚焦度, 聚焦是由观察方式首要指称或呈现的对象相对范围所决定的。聚焦度根据所呈现的范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高聚焦(窄式)、低聚焦(扩展式)、无聚焦(开放式)。高聚焦涉及单一场合发生的事件, 而且基本上是趋近于参照点并在此时实际发生或存在。低聚焦指事件可以是单一场合的、也可以是多个场合的, 虽然不限于趋近于参照点, 但事件必须实际发生。无聚焦指事件可以是单一场合的、也可以是多个场合的, 该事件原则上在参照点有可能发生, 但并不实际发生 (Johanson 2000:86)。

Johanson 对视点体的主要观点, 如表 1 所示。

表 1 界内体和界后体的聚焦度

界内体	界后体
高聚焦(最高度聚焦体)	高聚焦(结果完成体)
低聚焦(持续体)	低聚焦(过去完成体)
无聚焦(惯常体)	无聚焦(完整体)

1. 界内体

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通过语法化体现出聚焦界内体功能。在情状的界限内观察情状为“界内体”, 其视点在事件终界点之内的过程部分, 伯纳德·科姆里 (2016:19) 所称的“持续体”“惯常体”“未完成体”属于“界内体”。18 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只出现界内体聚焦度

低的视点标记 -Adur。

回鹘语中元音副动词 -A 和 tur- “起来、站” 经语法化后的形式-A tur- 表示情状的持续，源自“站立”这一静态意义（厄达尔 2017:262）。-A tur- 接泛时附加成分 -(X)r 后的形式为 -A turur，表示未必具有施事意义的持续或重复的动作。-A turur 在 18 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经过高度语法化，出现语音简缩现象并变为 -Adur。-Adur 可用于多场合的事件，呈现范围是扩展式的，情状在参照点可以实际发生也可以不实际发生，属于界内体低聚焦。例如^①：

- (1) uluğ čirik ibär-ip börk-ni tuta-dur.
大 军 派-ADVL 伯尔克-ACC 擒拿-NPAST.3sg
大军（即将）要擒拿伯尔克。（B:21）
- (2) molla niyaz katip bilä-dur.
毛拉尼亞孜 秘书 知道-NPAST.3sg
毛拉尼亞孜秘书知道。（C:15）

2. 界后体

从情状的界限之后观察情状为“界后体”，其视点在事件终点之后，伯纳德·科姆里（2016:12、46）所称的“完整体”“结果完成体”“过去完成体”“经历完成体”属于“界后体”。18 世纪维吾尔语语料中出现高聚焦和低聚焦界后体形式。

例 (3) 中的 -(X)pdur 调情状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发生，属于界后体高聚焦。回鹘语的后置动词结构 -(X)p tur- 接泛时附加成分 -(X)r 后的形式为 -(X)p turur，表示一种现在完成时（厄达尔 2017:268），表示的是情状发生在参照点之前。-(X)p turur 在 18 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经过高度语法化，出现语音简缩现象并变为 -(X)pdur，表示的情状发生时间在说话时间之前，而且距离说话时间相对遥远。例如：

- (3) ḥakimbäg silär-gä ant ič-ip beri-pdur.
阿奇木伯克 你们-DAT 发誓 AUX-ADVL AUX-NPAST.3sg
(听说) 阿奇木伯克给你们发誓了。（E:17）

在语料中的视点体标记为 -(X)p baq-，被力提甫·托乎提（2012:352）称作“尝试体”，其可看作伯纳德·科姆里（2016:48）所称的“经历完成体”，表示一种给定情状在从过去到现在的某一时间内至少发生了一次。例 (5) 中，说话者试图细想过这一情状，但说话者没有把握细想内容的准确性。

- (4) hät-niŋ ič-idiki söz-ni män yinčikälä-p baq-sa-m
书信-GEN 里-LQ 话-ACC 我 仔细-ADVL AUX-COND-1sg
我细想信中的意思……（D:21）
- (5) män teh̄imu qet̄ırqan-ip h̄iyal qıl-ip baq-sa-m
我 更 认真-ADVL 想-ADVL AUX-COND-1sg
我更加细想……（D:25）

^① 语法标注符号分别为——1：第一人称；2：第二人称；3：第三人称；ABL：从格；ACC：宾格；ADJL：形容词；ADVL：副动词；AOR：泛时；AUX：助词；CAUS：使动态；COND：条件式；DAT：向格；EQUI：比照格；GEN：属格；IMP：命令式；LOC：位格；LQ：地点标志格；NEG：否定成分；NMNL：动名词词缀；NPAST：非过去时；PART：连接语气词；PARTCP：形动词；pl：复数；POS：从属语缀；POST：后置词；PROB：无定；PST：过去时；Q：疑问语气词；REFL：反身态；sg：单数。

(二) 动貌

Johanson (2000:29) 对后置动词结构所表示的动貌范畴的看法基于以下基本假设：动词表达的动作原则上有起始点、终结点和两者之间的间隔点。

后置动词结构用于强调情状的动貌意义，对情状的内部含义进行重新分类。根据这种方法，后置动词结构可分为无变后置动词结构和有变后置动词结构两类 (Johanson 2021:573)。无变后置动词结构描述的行为情状没有始终界点，它可以被无限延长，也可以在任何一点中断，如 tur-“站”、qal-“留”等动词经语法化变为无变后置动词结构。若情状在自然演变的转折点，即拥有始变点和终变点，称之为有变后置动词结构。这种结构强调情状的始终两个界点，对界点不明的动词进行调整，动词突然打破始变点则带来“强烈”“突然”“迅捷”“彻底”等内部含义。如维吾尔语 ävät-“派遣”、qoy-“放”、at-“扔弃”、tašla-“扔弃”、kät-“去”、käl-“来”、čiq-“出”、čuš-“下”等动词经语法化变为有变后置动词结构。有变后置动词结构涉及一个过程，该过程指向一个明确界定的时间点，过了这个时间点该过程就不能持续。

1. 无变后置动词结构

无变后置动词结构中行为在内部时间上没有界限，其特点是行为不存在界点。18世纪维吾尔语无变后置动词结构的标记是 -(X)p tur-。无变后置动词结构表示动作、事件没有内在终结点，因而不会因其形成新的状态。无变后置动词结构所表示的情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构成这个情状过程的各个状态都被看作是同等的。-(X)p tur- 结构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同样表示事件经常或者习惯性发生，或者在不同场合重复发生 (力提甫·托乎提 2009)。例 (6) (7) 中，-(X)p tur- 结构在动貌较为模糊的动词短语中表达动作内容的静态状态。例如：

- (6) kečä kündüz qorq-up äymän-ip tur-a-män.
夜 昼 惧怕-ADVL 畏惧-ADVL AUX-NPAST-1sg
我昼夜都在惧怕(皇帝的威严)。(D:1)
- (7) özläri-nij küč-lär-i-din salamät bar-ıp kel-ip tur-a-dur.
您-GEN 力量-PL-POS.2sg-ACC 平安去-ADVL 来-ADVL AUX-NPAST.3sg
托您的厚意，他们能够平安来往。(C:1)

例 (6) 中，äymänip turamän 表示惧怕的情状持续之久；例 (7) 中，barip kelip turadur 表示进行平安来往的情状持续之久、重复之频。

2. 有变后置动词结构

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的有变后置动词结构表示行为情状的界限特征，这种界限是行为本身存在的界限。有变后置动词结构所表示的词汇意义是事件、情状的起始点和终结点，而不是其过程 (Johanson 2021:573)。根据“起点”或“终点”特征，有变后置动词结构也分为始变后置动词结构和终变后置动词结构两类 (Johanson 2021:573)。

1) 始变后置动词结构

始变后置动词结构根据起始点的背景描述情状，表示动作行为没有内在终结点，因而不会因其完成而形成新的状态。始变后置动词结构指示行为的开始和持续，并且行为已经从“无”的状态向“有”的状态转变。18世纪维吾尔语中始变后置动词结构的标记为 -GalI tur-，该结构频次较少，表示动作行为的开始。-GalI tur- 的语义特征是动作行为在时间轴上只有起点一个界限点，有相对较弱的时间持续性，但没有终点。例 (8) 中，-GalI tur- 表示行为起点在时间轴上所处的时间点，体现行为的外部界限。

- (8) ḥoja jan-lar qač-qalī tur-dī.
 霍集占-PL 逃跑-ADVL AUX-PAST.3sg
 霍集占(及其兵马)开始逃跑。(N:1)
- (9) alīm-mu ändo γälbä qıl-γalī tur-dī.
 阿里木-PART 非常 吵闹 做-ADVL AUX-PAST.3sg
 阿里木又开始大发脾气。(E:2)

例(8)中，-Gall tur-与动词qač-“逃”合并，表示动作行为的开始。由此可见，-Gall tur-表示一种动态变化。虽然用-Di表示“过去时”，但从以上例句的语义来看，动作行为的变化没有结束或终结。在现代维吾尔语中，-GIII tur-表示某一动作的开始(力提甫·托乎提 2009)。

2) 终变后置动词结构

终变后置动词结构根据终结点的背景描述情状，表示动作行为没有内在的终结点，因而不会因其完成而形成新的状态(Johanson 2021:573)。终变后置动词结构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在内部时间中只有终点一个界限点，没有起点，这种终点的性质决定动作行为是被如何描述的。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属于终变后置动词结构的标记主要有-(X)p čiq-、-(X)p ibär-、-(X)p at-、-(X)p tašla-等，终变后置动词结构表示行为已经从一种状态或形式向另一种状态或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能够确定时间到达一个极点的界限。例(10)(11)中，-(X)p čiq-表示动作行为的主体是由内而外运动，-(X)p čiq-与yan-“回”和qač-“跑”等实义动词结合，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

- (10) biz üčölän yan-ıp čiq-ıp i-dük.
 我们 三位 回-ADVL AUX-ADVL 是-PST.1pl
 我三人便出来了。(F:3)
- (11) qoryan-ni búz-up mähräm qač-ıp čiq-ti.
 城堡-ACC 破-ADVL 迈喇木 逃-ADVL AUX-PAST.3sg
 迈喇木突围出逃。(G:2)

因为各种后置动词结构的语法化程度不尽相同，在语法化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其词汇意义。有的后置动词结构经过语法化失去词汇意义，并逐渐演变为表达语法功能的语缀形式。如例(10)(11)，朝离心方向运动的动作行为中čiq-没有完全失去其词汇意义。这表明，动词语法化后在共时平面上呈现多样性。现代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X)p čiq-表示主动词所表达的动作经过一定的过程最终有一个结果的意义(力提甫·托乎提 2009)。

回鹘语后置动词结构-A id-和-(X)p id-表示动作行为的彻底完成(厄达尔 2017:270)，而到了18世纪维吾尔语时期，动词ibär-“派遣”^①已取代了回鹘语时期的动词id-。后置动词结构-(X)p ibär-是通过动词ibär-“派遣”的语法化而来的，-(X)p ibär-表示动作的趋向，即动作离说话人而去的方向进行，同时又表达行为的“结束”。例如：

- (12) šulzaman čiq-iŋ-lar dä-p här qaysi-ni yan-dur-up ibär-di-m.
 立刻 出-IMP-2pl 说-ADVL 各个-ACC 回-CAUS-ADVL AUX-PAST-1sg
 我即刻让他们返回了。(D:4)

^① 动词ibär-“派遣”也源于id-“派遣”，参见ibär-←iya ber-←ida ber- (Clauson 1972:37)。

- (13) häzrät-i hojä jahan-ni¹ elçi mädärji bilä čiçar-ıp ibär-gän er-di-lär.
 阁下-POS 和卓占-ACC 使者马达尔吉 POST 交出-ADVL AUX-ADJL 是-PAST-3pl
 (他们)让和卓占和马达尔吉二人出(城门),交给我们了。(A:102b)^①

例(12)的yandurup ibär-“送回”,例(13)的čiçarıp ibär-“交出”均表示动作行为的趋向,即朝离心方向运动的动作行为。

后置动词结构-(X)p ibär-在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中经过语音融合而变成-vät-的形式,哈密、吐鲁番方言中则变成-Avär-和-vat-两种形式(Yakup 2005:111-117)。现代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vät-表示主体处置性地、很干脆地做出实义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那么同一个成分在共时平面(现代维吾尔语及其方言)上为什么出现这些多样性呢?沈家煊(1998:41)指出,共时平面的语言变异是历史平面上语言演变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反映,语法化能为共时语法现象提供一种重要的解释。因此,追溯书面语-vät-和哈密、吐鲁番方言-Avär-、-vat-的来源及历时演变的过程,可以对其共时形式的多样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现代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vät-,有的学者根据吐鲁番方言中-vät-发音成-vat-的习惯,认为-vät-结构中的助动词成分应该为at-“扔”(力提甫·托乎提2009)。该助动词在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写作ات-,其也可以读作ät-“做”,但是该时段的文献中动词后缀接的形动词词缀是后元音形式-qan,而不是前元音形式-kän,由此可推断该助动词是at-,而不是ät-。哈米提·铁木尔(1983)认为,该助动词原型应为ävät-“派遣”,并根据以下两个方面论证其说:首先,后置动词结构-vät-的语法意义与助动词tašla-“扔弃”和kät-“回去”相似;其次,其功能与哈萨克语的jibär-“派遣”和乌兹别克语的yubör-“派遣”相同;-vät-是-(X)p副动词与助动词ävät-结合后,经语音融合而形成。阿不来提·依布拉音(1990)亦支持此说,并指出,-vät-是用综合手段表达的语法形式。本文所例的以上形式进一步印证此说。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还能看到与现代维吾尔语后置动词结构-vät-相近的另一种后置动词结构-(X)p at-。at-词汇意义是“抛弃、扔”,与实义动词的-(X)p副动词形式一起构成后置动词结构时,表示“激烈”“强烈”“突然”“意外”等语法意义。例如:

- (14) ‘abdulla-ni¹ özi čap-ıp qačur-up at-qan-i-γa qorq-up
 阿布都拉-ACC 自己 砍-ADVL 逃跑-ADVL AUX-ADJL-POS.3sg-DAT 怕-ADVL
 他因自己让阿布都拉逃跑而感到惧怕……(I:2)
- (15) siz de-gän šäriŋ-niŋ al-ıp at-qan türnaq-i-čä yoq.
 你 说-ADJL 策零-GEN 拿-ADVL AUX-NMNL 指甲-POS.3sg-EQUI 没有
 跟策零一比,你什么都不算。(H:2)
- (16) bu hät-ni siz šulzaman tut-up köy-dür-üp at-iŋ.
 这信-ACC 您 立刻 抓-ADVL 烧-CAUS-ADVL AUX-IMP
 这封信你立刻就烧掉。(D:2)

例(14)中,-(X)p at-结构表示利落粗鲁地进行某种动作行为;例(15)中,表示动作行为不由人把握、失去控制地完成的状态;例(16)中,行为完成速度异常迅速,在时间轴上占据一个极短的时间段甚至只占据一个时点。可见后置动词结构-(X)p at-表示实义动词所指动作的加剧、急速而猛烈地结束。

^①括号内84b表示文献页码,a表示正面,b表示反面。下同。

就其语法功能而言，-(X)p at- 和现代维吾尔语 -vät- 的功能相同，这说明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 -vät- 结构有两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因语义上表达相近的概念而在语音上演化出相同的形式：① -vät-←äväät-（←ibär-/yibär-/ibärt-）“送、寄”←回鹘语 īdu bär-；② -vät-←-p at-。哈密、吐鲁番方言中两种不同来源形成不同的形式，分别为 -Avär-←-(X)p ibär- 和 -vat-←-p at-。

维吾尔语中另一个助动词 tašla- 和 at- 的语义相同，表示“扔”。后置动词结构 -(X)p tašla- 表示主动词所表达的动作除去性地进行。终变后置动词结构的标记-(X)p tašla- 的语法意义与 -(X)p at- 相同，而现代维吾尔语中有些语境下两者可以互换。

18 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 -(X)p tašla- 表示动作的“强烈”“剧烈”“迅捷”。例 (17) (18) 表示实义动词所表达的动作彻底完成。-(X)p tašla- 结构除了表示行为的“结束”，还可以表示行为完成的速度异常迅速。与 -(X)p at- 相比，-(X)p tašla- 结构表示的行为在时间轴上占据的时间量更短，这与助动词词汇意义上的差异有关。虽然 tašla- 和 at- 都表示“扔”，前者会对后者在语义上不及之处有所补充，如“猛力、有力”，即“(扔得)更远”。例 (17) 强调瞬息间无意完成的行为动作，此时的行为是一种瞬时性的行为。

- (17) särkäşlik qıl-a-dur ki biyäkbar al-üp taš-la-yay bu šumluγ-din
执拗 做-NPAST.3sg 立刻 拿-ADVL AUX-DES 这 凶人-ABL
män häm halaş bol-aymän.
我 也 摆脱-IMP-1sg
(若骑手不佳，马匹的脾气)将变得暴烈，(它会想)：“怎能尽快摆脱(这个骑手)，我也就心安理得了。”(A:56a)
- (18) gahi näyzä birlä sanč-üp tašla-y-dur.
有时 刺刀 POST 插-ADVL AUX-NPAST.3sg
有时用刺刀插。(A:149a)

以行为到达终点前是否存在一个持续的时段过程为标准，将终变后置动词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瞬时终变，其所表示的行为到达终点前不存在一个持续的时段过程，如例 (10) (11) 和例 (12) – (18)。此类终变后置动词结构中的行为达到终点之前，不存在线性持续的渐变过程，即没有持续性，行为的始点不明确，没有持续的过程，瞬间到达终点，行为性质的变化也是一瞬间就完成的。第二种，是渐成终点，其表示的行为到达终点前，存在一个持续的时段过程，如例 (11) “出逃”是经过一个线性持续的渐变过程后，逐渐到达终点的。

总之，-(X)p ibär-、-(X)p at-、-(X)p tašla- 等后置动词结构表示到达终点的“结束”时间意义以外，还表示实义动词所表示动作的快速、急迅，也就是说具有“强化”功能。

四 情态范畴

一般情况下，情态可按照可能性—必然性进行研究。Lyons (1977:787) 的研究仍为可能性和必然性两个方面，而 Rentzsch (2015:9) 则把“意愿”归入情态范畴，关注事实性—非事实性、主观—客观、现实性—非现实性等相对概念。可见，情态的语义范围有不同的观点。

Auwera & Plungian (1998:86) 在构建情态语义地图时，将情态划分为参与者内在情态、参与者外在情态、认知情态和义务情态 4 类，每一类情态内部都分为可能性与必然性。其中，参与者内在情态指事件参与者的内在条件决定事态发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参与者外在情态

指参与者的外部环境决定事态发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义务情态是参与者外在情态的一个特殊子类，通常指说话人或其他人、社会规范或道德规范允许参与者参与到事态当中；认知情态则是指说话人对命题的判断。在 Auwera & Plungian (1998) 的情态分类法中，受影响最深的是参与者，是实现可能性事件或情况的人或事物。虽然“参与者”这一概念难以定义，但是凭借直觉可以判断具体句子的情态是参与者内在情态还是参与者外在情态。从形态角度来讲，维吾尔语的参与者以主格、所有格、向格等各范畴表示。从语义功能角度来讲，参与者有施事者、受事者、受动者等。

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的可能性情态标记是后置动词结构-GAII bol-和-(X)p tur-。后置动词结构-GAII bol-由目的副动词-GAII 和助动词bol-“当，成；发生”结合而成，并表示说话人根据客观条件或实际情况对动作行为是否能够实现的客观评价。后置动词结构-(X)p tur-表示动作行为发生后持续存在的状态。例(19)的-GAII bol-表示参与者外在情态的可能性，例(20)的-(X)p tur-表示参与者内在情态的可能性，例(21)的-(X)p tur-则表示参与者外在情态的可能性。

- (19) düşmän-lär hujum qıl-ıp kemin qıl-dü-lar. bu һalät-dä
敌人-pl 攻击 做-ADVL 埋伏 做-PAST-3pl 这 情况-LOC
čayla-dī ki, därya-dīn al-ıp öt-käli bol-ma-y-dur.
想-PAST.3sg 河-ABL 拿-ADVL 过-ADVL AUX-NEG-NPAST.3sg
敌军将矛刺，布下埋伏，(纳扎尔和卓)想，这种情况无法带(尸体)过河。(A:143b)
- (20) küç-üm-nij yet-iš-i-čä rastiki tehi tüzük küç-üm-ni ahtar-ıp
力-1sg-GEN 够-NMNL-POS.3sg-EQUI 真 还 正经的 力-1sg-ACC 查-ADVL
küç tut-a- (a)l-ma-dī-m, dä-p kečä kündüz qorq-up
效力-ADVL-AUX-NEG-PAST-1sg 说-ADVL 夜 昼 害怕-ADVL
äymän-ip tur-a-män.
畏惧-ADVL AUX-NPAST-1sg
即便没日没夜效力，还因怕未(给朝廷)做点贡献而昼夜惧怕(皇帝的威严)。(D:4)
- (21) osman bäg kaşqärlik-kä özi örgät-ip qoy-up töhmät qıl-dur-up
鄂斯瑞 伯克 喀什噶尔人-GEN 自己 教- ADVL AUX-ADVL 诬告 AUX- CAUS-ADVL
tur-adur.
AUX-NPAST.3sg
鄂斯瑞伯克暗中唆使喀什噶尔人诬告(我)。(K:28)

例(19)的说话者无法实现过河的起因是敌人紧追不舍，换言之，外在原因不允许发生这种可能性。例(20)说话者鄂斯瑞焦虑惶恐的原因是自己没有为皇帝尽力，表示的是参与者内在情态。例(21)说话者我，因鄂斯瑞的唆使而导致喀什噶尔人诬告，表示参与者外在情态。

Auwera & Plungian (1998:82) 将参与者内在可能性分为内在能力和后天能力等两个子类型。例(20)的语用意义是内在能力，例(19)(21)的语用意义则是后天能力。不过，参与者内在情态和参与者外在情态之间的对立不一定出现于语言实践。将可能性描述为参与者内在情态还是外在情态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如若要求情态的因素是距离，出行至某个地方的可能性可看作参与者外在情态，若要求情态的因素是参与者自身原因无法到达目的地，出行至

某个地方的可能性也可看作参与者内在情态。

18世纪维吾尔语的-GAll bol-和-(X)p tur-语义上的区别就如例(19)(20)(21)所示,-GAll bol-是参与者外在情态,-(X)p tur-对参与者外在/内在的情态对立不敏感,即处于客观状态。这种“有/无”对立中,-GAll bol-是[+参与者外在情态],而-(X)p tur-是[-参与者外在情态]。

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可能性的另一种表达手段为后置动词结构-A al-,其包括实义动词的元音副动词-A和助动词al-,其中al-的本意为“取,拿,要”。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标记,-A al-最早出现于14世纪上半叶的花刺子模突厥语文献中(Eckmann 1959:128)。到18世纪,-A al-已经发展成为维吾尔语中最常用的可能性情态标记。后置动词结构-(y)AlA-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表达能力、可能性和许可(力提甫·托乎提 2009)。

(22) abulay sultan yol-nïj oträ-sïr-da at aruq dä-p yet-ip
阿布赉苏勒坦 路-GEN 中间-POS.3sg-LOC 马 瘦 说-ADVL 到-ADVL
kel-ä-(a)l-mä-di.

来-ADVL-AUX-NEG-PAST.3sg

阿布赉苏勒坦称其马瘦故而未能前来。(J:2)

(23) bu čirik silär-gä bar-sa silär kašqär-ni saqla-p
这 兵 你们-DAT 去-COND.3sg 你们 喀什噶尔-ACC 守-ADVL
čida-(a)-(a)l-ur-mu-silär.
撑-ADVL-AUX-ADJL-Q-2pl

这大军前往喀什噶尔,你们能守住吗?(L:1)

例(22)中,阿布赉苏勒坦未到达的原因是马没有具备出行长途的能力。这种情况表示经过努力得以成功实施(或没有实施)某种动作行为,换言之,说话者有能力控制动作行为的实施(或没有实施)。例(23)表示对方是否有能力在大军到达喀什噶尔时还守护喀什噶尔。这种情况下,动作行为成功实施(或没有实施)不在说话者能力所控制的范围内。

在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后置动词结构-(X)p bol-表示参与者外在情态,而-A al-表示参与者内在情态,如例(20)(23)的-A al-表示参与者内在情态。例(20)中,没有效力是一种内在能力;例(23)中,大军压境喀什噶尔时无法守住,是因为自身没有这种能力。

综上可知,18世纪维吾尔语的可能性情态出现[土参与者内在情态]和[土参与者外在情态]两种“有/无”的对立。-(X)p tur-在这两种对立中都是[-参与者内在情态][-参与者外在情态],换言之,-(X)p tur-对参与者外在/内在的情态对立不敏感。在[土参与者内在情态]对立中,-A al-为[+参与者内在情态],-(X)p tur-为[-参与者内在情态],在[土参与者外在情态]对立中,-GAll bol-为[+参与者外在情态],-(X)p tur-为[-参与者外在情态]。

Rentzsch (2011:83)根据《巴布尔传》中出现的后置动词结构-A alA- (或者 -A al-)书写法的多样性,推测16世纪察合台语中该后置动词结构还没有完全变成语缀。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元音副动词-A与助动词al-均连写,这表明后置动词结构-A al-经语法化已形成新的语法语缀。

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的另一个可能性标记(或一个不可能的标记)是-(X)p bol-,由-(X)p副动词和助动词bol-“是,当;成为”构成,表示动作行为持续存在的状态。木再帕尔(2018)在讨论助动词bol-的语法化时,用大量实例刻画了bol-在古突厥碑铭文献、回鹘语

文献、近代维吾尔语文献和现代维吾尔语中的使用情况和语法化路径。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出现固定的形式-(X)p bolmas，主要表示规律性反复发生的事件，体现一种稳定的行为特征，同时又表示义务情态，即表示应当承担的义务。在这种义务情态中，其自身有义务做某事。例(24)表示说话人认为不允许参与者参与到事态当中。

- (24) qazaq šira-lar yänä yaman niyät qıl-ip yür-üp urba-yan-nij
 哈萨克锡喇-pl 还 坏 心意 做-ADVL AUX-ADV 透迤-ADJL-GEN
 učur-ii-ya ušulu-ni turumtay-ni ibär-ip bol-ma-s.
 原因-POS.3sg-DAT 五十六-ACC 托伦泰-ACC 派遣-ADVL AUX-NEG-NPAST
 哈萨克锡喇心怀不轨，无所畏惧，因此不能派往侍卫五十六、托伦泰。(M:1)

五 结语

在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存在功能多样的，由副动词附加成分-A/-y-、-Gall、-(X)p与助动词tur-、čiq-、ibär-、at-、tašla-、bol-、al-等组合构成的，置于实义动词后表达动词各种语法范畴的后置动词结构。本文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对后置动词结构的体貌和情态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后置动词结构经过语法化，重新形成不同的体貌范畴和情态范畴。

表体貌范畴是后置动词结构经语法化后出现的主要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体貌范畴包括事态本身的时间结构“动貌”和从视点方式观察事态时间结构的“体”。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出现的低聚焦界内体标记-A tur-和-(X)p tur-表示完成体；低聚焦界后体成分-(X)p baq-表示“尝试体”或者“经历完成体”。无变后置动词结构的标记是-(X)p tur-。始变后置动词结构根据起始点描述事件和情状，其标记是-Gall tur-。终变后置动词结构所表示的是趋向一个终点的运动，其标记是-(X)p čiq-、-(X)p ibär-、-(X)p at-、-(X)p tašla-，这些结构能够确定时间到达一个极点的界限，并表示到达终点的“结束”时间义，还具有“强化”功能。

后置动词结构经语法化后出现的另一种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是情态范畴，即从动力、责任、认知、示证等角度反映命题，表达说话人态度的语法范畴。18世纪维吾尔语文献中表示可能性的-Gall bol-和-A al-其语义分别为[+参与者外在情态]和[+参与者内在情态]，而-(X)p tur-的语义为[-参与者内在情态]、[-参与者外在情态]，-(X)p bol-则表示义务情态。

维吾尔语的后置动词结构语法化后变成语法功能成分，在表达特定语法意义的同时，伴随着语音简化，开始发生新一轮的语法化，并朝着过渡语法化的阶段发展。研究后置动词结构的语法化，有助于探讨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间的有机联系，以动态视角分析共时平面上的诸多变异现象。

参考文献

- [1] 阿不来提·依布拉音. 1990.《论现代维吾尔语动词的体范畴》(维吾尔文), 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突厥语研究》(3) 第103-159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 伯纳德·科姆里. 2016.《体范畴》, 郭利霞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厄达尔. 2017.《古突厥语语法》, 刘 钊 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4] 哈米提·铁木尔. 1983.《论维吾尔语助动词及其意义》(维吾尔文), 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

- 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突厥语研究》(2) 第 112-148 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5] Heine, B. & T. Kuteva. 2012.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 龙海平、谷 峰、肖小平译, 洪 波、谷 峰注释,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6] 力提甫·托乎提. 2009. 《论维吾尔语体助动词的功能》, 《民族语文》第 1 期.
 - [7] 力提甫·托乎提. 2012.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 刘丹青. 2001.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 《中国语文》第 2 期.
 - [9] 木再帕尔. 2018. 《维吾尔语 bol- “是、成为”之语法化》,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 2 期.
 - [10] 沈家煊. 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 《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 [11] 庄垣内正弘. 1979. 《〈五体清文鉴〉18世纪新ウイグル语の性格について》, 《言语研究》第七十五号第 31-53 页, 京都: 日本言语学会.
 - [12] Auwera, J. V. D. & V. A. Plung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 79-124.
 - [13] Clauson, G.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ndon.
 - [14] Eckmann, J. 1959. Das Chwarezmtürkische. In Jean Deny, Kaare Grønbech, Helmuth Scheel & Zeki Velidi Togan (eds.). *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Vol.1), pp. 113-137. Wiesbaden: Steiner.
 - [15] Haenisch, E. 1954. Em dreifacher Sprachführer Mandschu-Mongolisch-Turki in kurzer Answahl von 110 Beispielen. In Kaizuka Shigeki (eds.).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 Kagaku Kenkusu*, pp.184-191. Kyoto: Nissha.
 - [16] Johanson, L. 2000. Viewpoint operator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Östen Dahl (ed.).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pp. 27-187.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17] Johanson, L. 2021. *Turkic*. Cambridge: Cambir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Lyons, J. 1977.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Rentzsch, J. 2011. Modality in the Baburnama. *Turkic Languages*, 15: 78-125.
 - [20] Rentzsch, J. 2015. *Modality in the Turkic Languages. Form and Meaning from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n zur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Turkvölker 18).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 [21] Yakup, A. 2005. *The Turfan Dialect of Uyghu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ostverbal Construction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Uyghur Language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Features

Mihrigül Helil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pectuality and modalit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ata of postverbal constructions from the Chagatay archives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nd *Tä̡zikirä-yi ‘Äzizan*, focusing on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postverbal constructions of -*A tur-*, -(X)p *baq-*, -(X)p *tur-*, -(X)p *čiqli-*, -(X)p *ibär-*, -(X)p *at-*, -(X)p *tašla-*, -*Gall bol-*, -*A al-*, and -(X)p *bol-*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Uyghur language.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ostverbal constructions in Uyghur occur with a high frequency, and can express aspectuality and modality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Uyghur language postverbal constructions grammaticalization aspectuality modality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

《华南广西境内的语言演变：基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视角》出版

黄阳博士新著《华南广西境内的语言演变：基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视角》(The Changing Languages of Guangxi, Southern China: A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Approach)于2023年5月由美国Rowman & Littlefield (Lexington Books)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广西南宁地区粤语及周边侗台语为研究对象，从区域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完毕义”语素的功能变化，提出中国华南地区广西中南部可作为一个新的微观语言区域的论断。

该专著从不同的视角，描写和归纳了广西中南部的一些特异语言现象。在语言本体方面，详细描写了南宁粤语和粤语其他小片的“完毕义”语素“晒”，考察和分析了这些语素的不同句法分布和语义表达。同时，对侗台语中多功能性的“完毕义”语素进行了抽样考察，认为不同语境诱发了完毕义语素的具体语义，并据此绘制了这些语素共享的多元语法化路径及语义演变图，为世界其他语言“完毕义”语素的演变提供了类型学的参考。在语言接触方面，重点讨论了由汉—壮两种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事实，并详细分析了广西中南部语言的多种区域性特征，进而认为广西中南部可以作为一个微观的语言区域，为东南亚语言区域增添了新的家族成员，为区域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和实证。

该新著借鉴区域类型学和语言接触理论，对广西中南部复杂的语法现象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微观考察和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语言区域，对中国南方语言间语法接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和研究范式，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刘宇 刘忠莉